



时殷弘 主编

★ [英] 杰弗里·帕克 著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商务印书馆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时殷弘 主编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

〔英〕杰弗里·帕克 著

时殷弘 周桂银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英]杰弗里·帕克著;时殷弘,周桂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ISBN 978-7-100-06260-2

I. 腓… II. ①杰…②时…③周… III. 腓力二世-战略
思想-研究 IV. E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6271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

[英]杰弗里·帕克 著

时殷弘 周桂银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260-2

2010年4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6

定价: 60.00 元

《和平、战争和战略经典译丛》总序

战争是历史最悠久、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人类行为方式之一,而且在它与最为基本的人类社会存在形态即和平之间,有着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内在联系。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根本,是在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人类心理等类基本动因的复杂作用下(1)战争的酝酿和形成;(2)战争的进行和操作;(3)和平的缔造和维持;(4)在所有这些事态的展开过程中,战争与和平的具体性质的塑造以及上述所有基本动因的演化。

与此同时,关于战争的原本意义上的“战略”不仅一向在政治/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还随着对于战争与和平两者的一体性探究的进步,在现当代逐渐升华为更高层次上的“大战略”观念和“大战略”理论。它们涉及的,主要是把握“手段和大目标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综合认识、动员和协调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精神文化等各类国家资源,在此前提下确定(1)如何维持有利的和平或准备必要的战争;(2)如何在确保本国总的战后处境优于战前的意义上(或者说在“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意义上)打赢战争;(3)如何为了实现国家的根本政治目的而缔造有利的和尽可能稳定的战后和平。它们的基石,则在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大战略思考和实践,而对这些可谓构成了人类政治最悠久传统之一的行为方式的微观和宏观阐释,提供了关于政治行为和治国方略的学问的一大关键内容。

从克劳塞维茨开始,无论是以抽象和普遍的思想理论形态,还是以具体和特殊的历史考察方式,凡就和平、战争和战略分别所做的真正优秀的探究,都基于对这三者的一体化理解。如此的探究总是深入到具体的政治方针、军事战略和作战方式的表层下面,探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和平、战

2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

争和战略,考察它们的统一构造和内在动力,揭示它们与它们以外的整个社会/政治存在的联系。这就是实际上由克劳塞维茨首次开启的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军事的总体视野和总体分析。它们在经典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得到了辉煌的创造性发展,也在一些非常优秀的西方战争史和战略史著作中得到了杰出的体现。

正如第一流的战略史家和战略思想家保罗·肯尼迪和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言,“只有研习历史,才能产生对于什么是大战略、它如何能动地起作用、大战略的操作者在一个个具体环境中如何思考和行动的本质性理解。”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只要是略微复杂的,一般而言只能依靠对于具体时间和环境中的战略行为的具体考察得到,也就是只能依靠历史考察得到,而纯抽象的理论思维和推理在这方面所能成就的颇为有限。就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比战略更广泛、更基本的范畴而言同样如此。然而,这样的历史考察不同于一般的史事叙说,它以理论性思考之始终不渝的主导作用和战略主题之首尾一贯的“聚焦”效应为特征,其很大部分目的就在于揭示“超越时间和环境”的战略逻辑和战略理论。

作为有机整体的统一运动,在政治、军事和社会等类基本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和平、战争和战略三者形成并展示其动能和机理:这就是本套译丛的主题,一个以活生生的历史来展现和说明的主题。本译丛由皆可称为经典或至少准经典的当代名著组成。它们的作者皆为战争史、战略史、战略理论、国际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理论思想领域的世界一流学者,有的人甚至是其所在专业领域的当代头号泰斗。不仅如此,这些著作大多是他们的最重要代表作。可以相信,在当今中国,由于显而易见和非同小可的政治、社会和学术需要,翻译出版本套译丛既具有不应低估的学理意义,也具有相当重大的现实价值。

时 殷 弘

2007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致谢.....	1
平装版前言.....	3
关于几类习语的说明.....	4
前言.....	5
年表	12
 导言:腓力二世是否有一个大战略?	23
 第一部分:战略文化环境	35
第一章 “世上最大头脑”	39
第二章 距离:头号公敌?	79
第三章 “上帝在我们这边”	114
 第二部分:大战略的形成	155
第四章 “欧洲的大泥沼”:尼德兰(1555 至 1577 年)	159
第五章 “英国问题”(1558 至 1585 年)	197
第六章 “英国大业”(1585 至 1588 年)	235
 第三部分:大战略的实施	265
第七章 欧洲尽人皆知的秘密?	269

2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

第八章 帕尔马是否做好了准备?	293
第九章 八月炮火	319
第十章 无敌舰队之后	341
 结束语:载体与结构	 356
 注释	 375
史料来源说明	495
参考文献目录	508
索引	535

致 谢

xi

30年前,黑利·柯尼斯贝格尔提醒我需要确定腓力二世是否有一个大战略,由此提示了应当提出的问题的种类,加上可能找到的某些证据。然而,直到1987年回应两项邀请时为止,我一直未曾认真地去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威廉森·默里请我为他打算编写的“缔造战略”一书撰写一章:我被安排的任务是写哈布斯堡西班牙。是年晚些时候,紧随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出版,唐·希金博特姆请我评论其第二章(题为“哈布斯堡的霸权图谋”),作为他就这部重要著作举行的研讨会的一部分。我无法相信,没有我在伊利诺斯大学厄巴纳-尚佩恩分校(我当时刚开始在那里授课)的同事约翰·林恩的推荐,默里或希金博特姆会提到我的名字。因此,我首先感谢所有这些历史学家,他们鼓励我去考察腓力二世是否确实有一个大战略,并且帮助我去寻找重现这一大战略的途径。

本书内有四章的原型业已在他处面世:第四章的原型载于E.拉德维希·彼得森、K. J. V. 耶斯佩森和H. 斯特芬博尔格合编《文化冲突:尼尔斯·斯滕加尔德纪念文集》(欧登塞1992年版);第七章的原型载于K. 尼尔森和B. J. C. 麦克切尔合编《侦察国土》(纽约1992年版);第八章的原型载于H. 索莱伊和R. 费尔梅伊尔合编《旧尼德兰的政策和治理:米沙尔·巴尔德教授友人文集》(根特1993年版);第九章的原型载于《海员之镜》杂志第82卷(1996年)。我感谢允许我在此复用某些由其委托撰写的著述的编者和出版商。

我还想感谢那些与我分享其特殊洞察的人们。除了每章内予以致谢的帮助之外,我还须举出四位学者的贡献,他们使我知晓了该主题的一些重要方面,没有他们我便可能忽视掉。克拉拉·加西亚-艾卢阿尔多

2 腓力二世的大战略

和南希·范德森尽其所能,使图景内始终保有腓力的美洲领地;马里奥·里索启示我考察西属意大利;还有费尔南多·博萨,他与我分享他所掌握的关于腓力一生与其统治的种种错综复杂和内幕隐情的知识。

xii 本书的构想、研究和写作是在1987年一次多发性硬化症诊断改变了我的生活之后。虽然我希望我的健康问题没有影响最后成果的质量,但它肯定使得准备过程复杂化了。我所以能够努力做完,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一批图书馆员和档案馆员的好心相助和善解人意,他们为方便我查阅馆藏而竭尽所能;还要归因于我在过去十年里就教的三所美国大学,它们给予了慷慨的研究资助;最后还归因于帮助我准备资料的研究助手们(由同一些大学出资)的蓬勃精力,他们是伊利诺斯大学的杰弗里·麦基格、玛丽·斯普朗奇和爱德华·特纳斯,耶鲁大学的保罗·艾伦、保罗·多弗、玛莎·霍夫曼-斯特罗克和迈克尔·莱文,还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查尔斯·夏普。我感谢他们所有人,也感谢有求即应地为我取得种种资料的贝特尼·阿拉姆、克里斯蒂娜·博雷古埃罗·贝尔特兰、理查德·卡根和凯瑟琳·劳伦斯,连同帮助编排索引的保罗·希本。

最后,我极其感谢那些对我的打字稿做出评论和给予宝贵评注和建议的人们:保罗·艾伦、托姆·阿诺尔德、马克·乔特、埃利奥特·科恩、约·杰尔马丁、迈克尔·莱文、菲尔·泰特洛克和南希·范德森阅读了第一部分,罗伯特·鲍多克、杰里米·布莱克、费尔南多·博萨、罗伯特·考利、德里克·克罗克斯顿、安东尼奥·费罗斯、费尔南多·贡萨莱斯·德莱翁、黑利·柯尼斯贝格尔、内德·勒波、彼得·皮尔逊、玛丽亚·何塞·罗德里格斯-萨尔加多和马修·韦克斯曼阅读了全篇。我在每章的附注中记载了其他学术借鉴。

本书献给我的四个孩子——苏茜、埃德、理查德和杰米,感谢他们带入我的生活的爱和快乐。

平装版前言

我利用此次重印的机会改正了少量错处,并且更新了几项参考文献。在其他方面,我决定保持原貌,尽管将见于一些著作的新资料包括进来非常诱人,这些著作像本书一样在1998年——腓力去世四百周年——出版。对原本的西班牙文引语感兴趣的人可以在本书的西班牙文版本 *La Gran Estrategia de Felipe II* (Madrid: Alianza, 1998) 中找到。

我极其感谢费尔南多·博萨、彼得·皮尔逊、斯塔福德·普尔和南希·范德森,他们协助我做出了这些修改。我感谢伦敦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罗伯特·鲍多克、凯文·布朗和阿历克斯·内斯比特,因为他们很有经验和满怀同情地处理了一部难弄的文本,连同我这个苛求的作者。

关于几类习语的说明

对于有约定俗成的英语形态的外国地名(例如科伦纳、海牙、布鲁塞尔、威尼斯、维也纳),我便沿用之,否则我倾向于当今在该地本身使用的名称。与此类似,对于人名我采用标准的英语形态(例如奥兰治的威廉、奥地利的唐·约翰,当然还有腓力二世),但此外我采用有关人士自己使用的名字和头衔。

为避免混淆和便于比较,本书内述及的所有货币数目皆以西班牙钱币达克特表示,一个达克特在16世纪晚期大致等于一个埃斯库多(或克朗),或两个弗罗林。大约四个达克特值一英镑。

1581年2月24日,教皇格雷戈里十三下令日历前推10天。然而,不同国家采用“新历”的时间不同:例如西班牙在1582年10月4(15)日,大多数(而非全体)对腓力二世造反的尼德兰省份在1582年12月14(25)日,“效忠”的省份在1583年2月11(22)日,等等。本书中的所有日期从1582年10月起皆用新历表示,除非另有说明,而且通贯全书我始终假定每个历年自1月1日开始(而不像在朱利安旧历中那样自3月25日开始)。

前 言

xv

1543 年腓力二世年方十六,开始行使权力,当时他的父亲查理五世任命他为西班牙摄政。1554 年他成为那不勒斯和英国的国王,翌年查理又使之成为尼德兰统治者。1556 年他继承父亲在美洲和在欧洲大多数地方的领地,并于 1580 年取得葡萄牙及其海外属地。从那时起,直至 1598 年驾崩,腓力统治着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人试图去精确地研究他如何进行其统治:在他的种种政策之下有着怎样的战略轻重缓急次序,何种惯例和偏见影响了他的决策,什么外部因素影响了他的目的的实现。

这一忽视大有原因。首先,数十万份保存下来的由这位国王撰写或别人进呈的文件和资料堆积如山,令人望而却步。恰如腓力承认无法充分摄入有关其帝国内多个国家和它们面对的种种难题的所有有用信息一样,没有任何单个的历史学家可能找到时间去阅读和考查所有有用资料,即那些就其整个统治时期内所有各地区而言可得的资料。也没有谁在如此行事方面必定聪明过人,首先因为大量重要文件业已遗失,其次因为大量有关政策形成的重要事情永无可能为人所知。用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话说,“最终决定的本质是观察者——确实往往还有决策者本人——始终无法看透的……决策过程中总会有隐晦不清、错综复杂的情节,它们甚至对那些可能最密切地介入其中的人来说也神秘莫名”。¹

因此,本书通过一系列调查探讨腓力二世的大战略。第一部分(犹如)横向展开,考察西班牙战略文化的一般环境:这位国王的与众不同的政府体系;有将其淹没之险的“信息超载”;还有用以克服目的与手段之间抵牾的、战略上种种不同的轻重缓急规定和前提假设。在此,资料来自

所有各个时期和所有各个操作区域。然而,不可能在同样的规模上考察腓力大战略的实际缔造或贯彻——不仅是因为文件的遗失和决策过程的
xvi “神秘莫名”性质,也是因为要恰当地考虑这位国王的政策,就需要考察他的盟友和敌手的战略和目的。如同冷战史学家们已清楚地显示的那样,一种基于所有参与者的档案记录的“对称的研究”,一种能够对照“现实”来衡量每个国家关于别国的知觉(和误觉)的研究,是探索国际关系的唯一可行的方法。²因而,本书其余部分的调查“纵向”展开,只是详细探究对称方式能够在其中得到应用的那些领域。第二部分考察留存下来的——从哈布斯堡家族及其盟友和敌手那里留存下来的——战略缔造文件,以便探明仅仅三个实例:腓力 1555 至 1577 年期间维持他在尼德兰的权威的徒劳努力(第四章);1558 至 1585 年期间他就与苏格兰和英格兰关系所作的大有缺陷的和平时期处理(第五章);他从 1585 至 1588 年为其半途夭折的征服英国图谋而对外交、经济和陆海军资源的动员(第六章)。第三部分考察大战略之执行的三个方面(特别涉及那些选定的领域),在那里显然国王的政策由于下述致命的弊端而注定失败:他未能阻止外国情报人员探得他的规划(第七章);他未能在作战层面协调后勤和沟通(第八章);最后,他对改变着的战争技术和战术认识不周(第九章)。第十章考察国王及其大臣从无敌舰队的失败中汲取的教训,结论部分则讨论假如采取别的政策选择,或者换一位统治者或有一种不同的战略文化,最后结果是否可能两样。

挑选这些特殊实例来做研究既反映了文件留存格局,也反映了作者的语言能力局限。首先,1559 年里一艘载运腓力的个人文件的船只从尼德兰驶往西班牙途中沉没,使得实际上不可能重现他在那时以前的大战略。相反,国王 1573 年指定马特奥·巴斯克斯担任其私人秘书的决定引入了这么一位管理者:他的有条不紊的习惯——特别是给经过他书桌的差不多每份文件都标上日期的习惯——使人有可能重现国王政策之逐日,甚至有时是逐时的演化。数以万计的皇家“短简”(备忘录)井然有序地留存下来,直到 1591 年巴斯克斯去世为止。同样重要的是,腓力将自

己内心最深处的希望、恐惧和沮丧吐露给巴斯克斯(后者兼任其私人神父),因此他们之间的书信往往透露了这位国王的目的和动机,以及他做出决定的过程。然而,在考察哈布斯堡政策方面“对称”的需要意味着我只能使用这些丰饶成果的某些部分;最重要的是,腓力的地中海战略大多处于本书考察范围之外,因为其敌手——土耳其苏丹及其北非附庸的记录是用当今极少人能读的语言写的。完全依据西方资料再度叙述西班牙的地中海战略全无意义;关于这一课题的恰当研究须待一位在语言学和古文书学方面造诣深厚的学者。³然而与之相反,腓力的另外两个主要敌手——英国和荷兰共和国的公私档案丰富,有如任何 16 世纪国家在这方面的情况(英国的还编排得好得多)。它们不但透露出腓力及其幕僚对于敌手怀抱严重的错觉,而且表明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决策受损于许多同样的问题。不仅如此,腓力的大战略在这两个国家手里碰到了克星。在地中海,如同在美洲,国王达到了他的大多数政策目的;但在尼德兰和英国却并非如此,从而开始了西班牙作为一个强国的衰落。理解这一失败的种种原因至关重要。

xvii

在方法论上,本书结合了三类证据。首先,就 1570 年代和 1580 年代而言留存丰富的国王手书政策陈述得到了广泛的引用。补足它们的是各个不同政府机构的记录,连同一些重臣的记录(因为阿尔瓦公爵和梅迪纳·西多尼亚公爵或格朗维勒红衣主教等人汇集起来的私人档案,包含许多现今会被储存在国家档案馆内的文件)。其次,笔者考察了常驻西班牙宫廷的十多个大使的公函。虽然过度依赖外国外交官的看法有时会导致历史学家犯错,但大使报告在被拿来与经仔细调查的政府行为和政府政策辩论秘录进行有力的比较时,它们(如利奥波德·冯·兰克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显示的)构成研究现代早期政治史的一个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资料来源。⁴最后,来自其他国家的比较性资料被大量使用。为了评价腓力作为一项复杂的“跨国”事业之首席执行官的表现,三个领域的类似物都被包括了进来。第一,现代战略研究得到了利用,那基于一个前提,

即在 20 世纪全球性帝国面对的种种挑战中,有许多大概与它们的 16 世纪先驱所面对的相像。于是,腓力 1574 年不靠掘开海堤淹没反叛诸省来结束荷兰造反的决定,被拿来与四百年后的一件事情对照,即林登·约翰逊总统非常相似地不愿为淹没美国政策敌对者居住的地区而摧毁越南的红河堤岸。第二,现今商业经营理论得到了考察,依据的理由类似,即相隔几个世纪的“全球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大概也处理许多相似的问题,并且以相似的方式处理。此中也援引了彼得·德鲁克之类分析家论说什么造就出一名“高效经理”的著作,以便表明腓力的某些(虽然并非所有)经管方法符合现代标准。的确,有些事情永恒不变:“人是时间消费者,大多数人是时间浪费者”——此乃德鲁克的警句之一,腓力亦衷心赞同,因而他大被诟病地坚持规避开会。最后,为了评价腓力所遇问题的性质与其反应的性质,本书借鉴了别个世纪里的别个专权统治者的行为。这位国王(如同其他领导人)太经常地由那些没有权势行使经历的人评判。^{xviii} 他的某些行政习惯——例如创设分立的、往往互相竞争的机构去处理类似的问题,或者坚持他的信息必须来自许多独立的渠道——令麾下官员不知所措,也将过重的负担放在他自己肩上。可是,由于别的国务活动家,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完全一样行事,因而历史学家们不应当过快地去指责腓力。

这些比较还有助于避免一种通常的诱惑,那就是将失败当作不可避免而不予考虑,并且假定只要当事者多一点儿“理性”,他们本会将自己的规划调整得比较接近自己的资源。另一个日不落帝国的统治者、遭人谤议远甚的乔治三世,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致其首席大臣诺思勋爵的一封信中,雄辩地谈论了这种谬见:

没有任何摆脱目前困难的倾向……能够诱使我步入在我看来是毁坏帝国之途。我常听到诺思勋爵随意发话,说这场较量永远得不偿失。我承认,不管战争有多成功,只要人们坐下来衡量一下代价,他们就会发现……它使国库枯竭,个人中饱,并且或许仅仅抬高了征

服者的名声。然而,这只是用柜台后面的商人之秤称量此类事件。在虔信之士看来,由我权衡度算必使神圣上帝喜悦:我会掂估代价尽管甚大,却是否有时实属必须,以阻止可能比丧失钱财更令一国毁伤之事。

为了理解在现代早期国务活动家和战略家看来什么显得符合理性,就必须将他们的心理世界和前提假设考虑进来。⁵

本书试图供三类读者研读。首先,显然是那些与作者一样对腓力着迷的人,他们当会在此发现某些有趣的东西。自从我首次费劲阅读这位国王的笔画曲折的手书,至今已有 32 年;那些资料留存如此之多,以至许多他写的东西依然无人问津。然而我相信,由这位国王及其亲密幕僚创作的足够多的资料得到了研读,据此能够提供一幅内在连贯的图景,显示他们如何看待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如何力争使事态变得对他们有利。第二,那些使我获学良多的战略分析家们可能会惊奇地发现,他们在现代世界研究的一些问题和难点也是四百年前的国务活动家和官员们所面对的。因而,他们也可以在本书中发现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最后,对大国兴衰感兴趣的人有许多将受到本书的“非线性”结论的挑战,因为在经考察的每项研究实例中,小因素显然造成了相对迅速和完全不成比例的后果。

历史因果联系的非线性理论许久以来总不时髦。例如,20 世纪最著名 xix 的欧洲历史学家费尔南德·布罗代尔就轻率地将“事件”贬为不值得考虑的,说它们仅是“表面扰动,历史大潮在其强有力的波峰上携带的表层泡沫”;他则是在往昔的复杂结构中就重大现象探求解释。在 1946 年 5 月撰写的一则文字中,他发出了如下明确的警告:

历史学家设身处地阅读腓力二世文件,发现自己被载运进了一个古怪的单维世界,一个的确有着强烈激情的世界,如同任何其他生命世界(包括我们自己的)一样盲目,昧然不知历史的更深刻现实,茫然不觉涌动奔腾的洋流,在其上我们那脆弱的帆船如同蛤壳一般

颠簸摇摆。这是个危险的世界,但也是个我们应当驱除其魅力惑惑和魔法迷乱的世界,办法是首先确保探明那些深层洋流,它们往往悄然无声,其方向只有通过观察其长时期状态才能予以辨识。显赫的事件往往只是瞬息即逝的迸发,只是这些更大的运动的表面显示,而且只有根据它们才可予以说明。⁶

然而,“往往”有别于“总是”。我不相信历史总是一种线性过程,在其中对每个重大事件的解释都必须求索于即使不需上溯几世纪也需上溯几十年的事态发展;相反,相对微小的事态发展有时产生了大得不成比例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而不仅仅是更大的运动的“表面显示”。在我看来,见于自然界的非线性过程也运行于历史之中,因为一个小事件——有时被称为“触发点”——有时能够开启一个新趋势;而且,在战争中甚至在任何其他场合,小的、看来微不足道的因素更经常地产生意外的重大变化。战斗分明如此,但它也影响到战略,后者涉及人员、金钱、军火和辅助性战力(即后勤、通讯、情报)的如此巨量的部署,以至难得能够依据任何理性预见到结局和结果。⁷

在腓力的同代人中间,有许多亦持此见。在阿姆斯特丹行政长官科尔内利斯·皮特尔索恩·霍夫特眼里,西班牙的失败即使事后来看也显得异常夺目:“我们源自青萍之末,”他在1617年写道,“与西班牙国王相比,我们有如一只与大象争斗的小鼠。”⁸在本书集中考察的1570年代和1580年代,腓力一次又一次地动员起充足的资源——不仅有陆海军资源,还有外交、经济和精神资源——以确保胜利,但到头来由于某种他未能预见到、他的规划也未为之留有余地的事情而遭到失败。当然,这不是说结构性因素没有对结果的形成起任何作用:腓力的决策风格没有给突发事件或“退路战略”留有余地,这一事实被证明是个关键的缺陷;他不得不捍卫的帝国缺乏地理内聚性,事实也已证明,以致若干暴露在外的部分xx反复遭到不同敌手的威胁。事情说到底是个平衡问题:一如既往,单位和结构都须予以恰如其分的考虑。然而对笔者来说,首先,在挫败一个表